

# 天下無雙 古今鮮對——

何傳馨

## 晉唐法書名蹟特展

中國書法到了三世紀的三國（二二〇—二八〇）西晉（二六五—三一六）之際，是各書體演變完成的時期，此後楷書及行、草書應用日廣，蔚成新風氣。四世紀東晉（三一七—四二〇）時，書家致力於鍛練書法技藝，探究筆法中如同自然妙有的美感，追求「工夫」與「天然」並美，古體與今體兼備，以達於盡善盡美的境界。其中尤以「書聖」王羲之最具典型。南朝（四二〇—五八九）至隋唐（五八一—九〇七），由帝王主導，進行王羲之等名家書蹟的收藏鑑定、編次裝帙及摹寫刻石等作為，建立了以王羲之為模範的古典傳統。中唐以後，典雅精緻的宮廷書風轉

變，平民書家在書法創作中，加入富於個人魅力的技藝表現，士人書家則著重於情性的表達，書家的人格、學識與修養成為書法藝術的重要評價內容，為後世士人書法開啟了新的契機。

不過晉唐書蹟歷經千餘年流傳，因人為與時空因素，幾乎流失將盡，例如王羲之親筆墨蹟，至今已蕩然不存，其他傳世公認可靠的晉唐書蹟除了本院外，分散於中國大陸、日本、美國等重要博物館，多列為國家至寶，同一時間完整觀賞這些名蹟，至為難得。有鑑於此，本院於二〇〇八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月二十日，推出「晉唐法書名蹟展」，分為「王羲之與唐代書法」、「書

法理論與實踐」、「書如其人」及「應用文書與書法」四個單元，展出院藏十五件題為晉唐人墨蹟，其中兩件為蘭千山館寄存的重要藏品，另配合展出兩件相關拓本。以下選擇展覽中主要的展品，概述其內容與書法。

### 王羲之與唐代書法

王羲之（三〇三—三六一，一說三〇七—三六五），山東臨沂人，出身名門世族，歷任祕書郎、會稽王友、臨川（江西）太守、征西將軍庾亮參軍、長史、寧遠將軍、江州刺史、護軍將軍、右軍將軍、會稽內史等職，永和十一年（三五五）退官，於父母墓前立誓，不再出仕。升



圖一 《快雪時晴帖》 冊 23×14.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平五年（三六一）去世，贈金紫光祿大夫。

王羲之少年即有才名，受到父兄輩的賞識，以「朗拔」、「清貴」、「清鑒」、「骨鯁」稱之。為官時關懷民生時事，心繫北伐戰事，顯示出他富於儒家情操。去職後與東土名士盡山水之遊，信仰老莊，崇尚自然，熱衷詩歌、音樂與書法。關於他的書法傳承，據南朝人記載，初學衛夫人（鑠）與王廙，後來改變初學，博採眾長，精研體勢，增損古法，一變漢、魏質樸書風，創妍美流變之體。論者以「字勢雄逸，如龍跳天門，虎臥鳳闕」（梁武帝），「點曳之工，裁成之妙，煙霏露結，狀若斷而還連；鳳翥龍蟠，勢如斜而反直」（唐太宗）稱贊其結體、筆勢與形態之優美。

王羲之書法在當代以來即受贊賞，不過在南朝時期仍有爭議，一般認為要到唐太宗（五六八—六四九）的極力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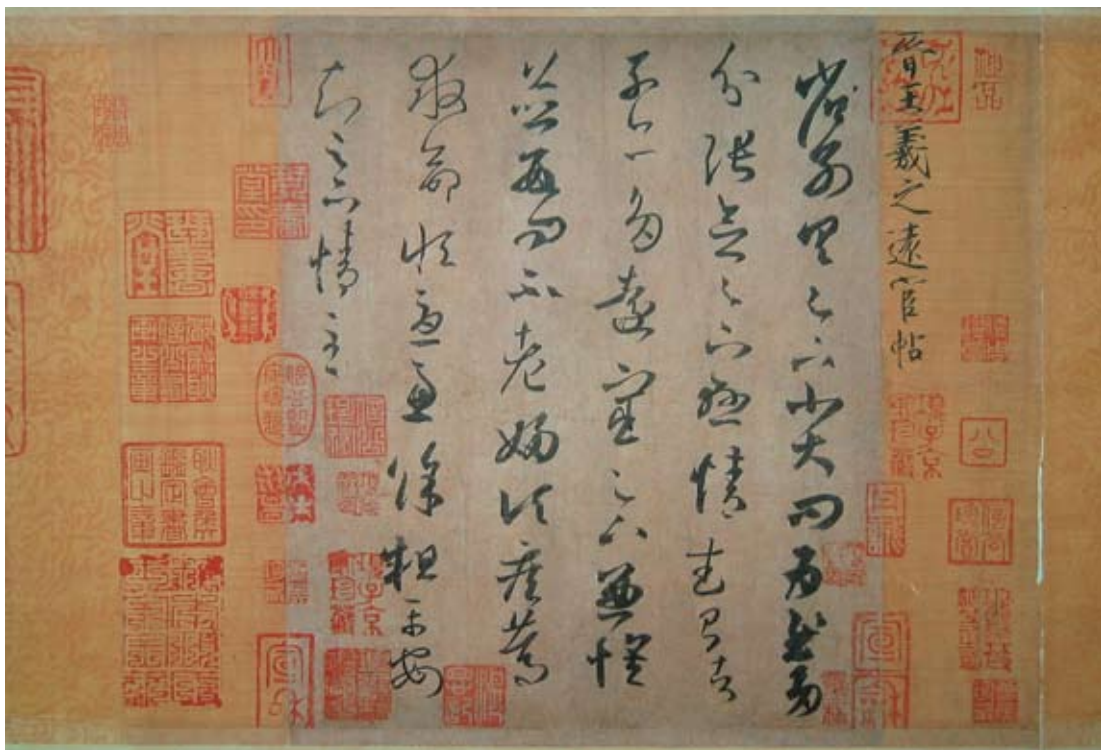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 〈平安何如奉橋帖〉 卷 24.7×46.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護，始定於一尊，並影響千餘年中國書法的發展。唐太宗詔修《晉書》，並親自作王羲之傳論，評論鍾繇、王獻之、蕭子雲（四八六—五四八）等書家的缺點，以顯示王羲之書法的「盡善盡美」。另外貞觀年間，唐太宗出御府金帛，搜購民間所藏王羲之等書蹟，命魏徵、虞世南（五五八—六三四）、褚遂良（五九六—六五八）等鑑定真偽，至貞觀十三年（六三九）十二月將所得書蹟裝裱完成，總計二千二百九十紙，裝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。

太宗又令專人模寫王羲之書，頒賜大臣，書史上為人津津樂道的何延之《蘭亭記》中，說太宗命御史蕭翼從辯才和尚騙取《蘭亭序》之事，或許就是因太宗積極搜求古蹟而出現的傳說。當時太宗也命供奉搨書人趙模、韓道政、馮承素、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蘭亭，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。

褚遂良在鑑別整理這批數量龐大的書蹟時，留下了一份王羲之楷書與行書的記錄，名為《右軍書目》。（《法書要錄》卷九）所錄分兩部份，一是正書五卷十四帖，其二是行書五十八卷二百六十七帖，每卷書帖名或帖中數字，並注明行數。後來張彥遠《活動於九世紀》編《右軍書記》，（《法書要錄》卷十）所收書蹟合計有四百六十五帖。這些王羲之親筆墨蹟已不存於世，不過藉著精鈎細摹，或名家的臨寫與刻石，化身千百，流傳千載。展覽中《快雪時晴帖》冊、《平安何如奉橋帖》卷及《遠宦帖》卷三件名蹟，代表王羲之行楷、行、草三種面貌。

《快雪時晴帖》冊，（圖一）行楷書。書法以圓筆藏鋒為主，起筆與收筆，鈎挑波撇都不露鋒銳，由橫轉豎也多為圓轉的筆法，結體與整安穩，顯現氣定神閒，不疾不徐的情



圖三 〈遠宦帖〉 卷 26.1×17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態，評論家以「圓勁古雅，意致優閒逸裕，味之深不可測」形容它的特色。書蹟上有「君倩」題名，米芾認為是梁秀，但史書未見其人，不詳其生平，近人考為唐高祖駙馬薛君倩。旁有「褚」字半印，傳為褚遂良所鈐。對幅有元代趙孟頫於延祐五年（一三一八）奉

仁宗命題跋，其中「快雪時晴」四字與本幅神似，可以看出王羲之對後世書家的影響。由其他收傳印記與著錄，可考

知原蹟歷經南宋、元代內府及明清著名收藏家寶藏，於康熙年間入藏清宮。乾隆帝譽之為「天下無雙，古今鮮對」，將它與王獻之的〈中秋帖〉、王珣的〈伯遠帖〉合稱為「三希」，珍藏於「三希堂」中。

此帖王羲之墨蹟四行，只占一開之半，其餘前副頁四開，後副頁九開及本幅的對幅，都有乾隆題詩、題識與摹古繪畫。這些題識總計有六十三則，書寫年代從乾隆十一年到

六十年退位以後（一七四六一七九五），可見珍祕之深，也具體代表乾隆皇帝鑑藏晉唐古蹟的特殊方式。

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卷，（圖二）行書，以雙鉤廓填的方式，複製三件王羲之行書短札。三帖中，〈平安帖〉運筆提按頓挫的變化較多，鉤挑轉折間，鋒穎秀發，一些牽絲引帶的草書筆法，也十分生動靈巧。〈何如帖〉較端整，「復」字重覆三次，各不相同。〈奉橘帖〉字形大小偃仰，饒富變化，「三」字如橫空掠燕，筆畫互有照應，「百」字起筆上揚，末畫斜下挫鋒，筆鋒幾經轉折，並露出賊毫，「未」字出現兩次，筆法也不盡相同。

褚遂良編寫的〈右軍書目〉草（行）書第六卷有一則「羲之白，不審尊體比復如何（下注五行）」。有的研究者認為即是故宮藏摹本王羲之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卷的後二

# 定武蘭亭真本

元柯九思舊藏今歸經訓堂畢氏

丹徒王文治記



帖（何如、奉橘二帖合起來正好是五行）。而第十七卷有「此粗平安」一帖，但沒有記載行數，也可能是今卷的第一帖（平安帖）。帖中有細線鉤勒原蹟殘損情況，部份字蹟也留下雙鉤填墨的痕迹，同時摹出梁朝鑑帖人徐僧權（活動於六世紀初）、唐懷充（活動於六世紀前半）、隋代鑑帖人姚察（活動於六世紀末）的押署，卷末四行小楷題記云：「開皇十八年（五九八）三月廿七日。參軍事學士諸葛穎。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。釋智果。」這三人都是隋時晉王楊廣府中鑑別古帖的專家。從摹搨的觀點來看，此帖忠實於字形體勢，對於理解王羲之書風極有參考價值，也保存了唐代以前古蹟鑑藏的形式。

## 〈遠宦帖〉卷，（圖三）

草書。係晚年寫與友人周撫的一封信，向友人及其親人問候，並提到妻子的病況。原蹟在唐太宗時連同其他二十六紙

（或二十八紙）書札同裱為一卷，名為〈十七帖〉，今僅存此件唐代精摹本。王羲之的草書變化東漢以來發展的隸草與章草，創造筆勢流利，變化多端的「今草」，點畫間，充滿起伏頓挫的運筆動態，唐朝人形容為：「一畫之間，變起伏於鋒杪，一點之內，殊衄挫於豪芒。」對照傳世〈十七帖〉刻本，此帖不但精確掌握筆鋒提頓扭轉的變化，也忠實的保留原蹟筆畫跨過紙張摺痕產生的筆觸（日本學者稱之為節筆）。本卷曾經宣和內府收藏，著錄於《宣和書譜》（卷十三），前隔水黃絹有宋徽宗親筆瘦金書題籤，本幅與前後隔水四角有雙龍方印、宣紙、大觀、宣和鑑藏印，是考察徽宗鑑藏的重要依據。

王羲之的書法在唐代也透過集字刻石的方式流傳於後世。貞觀三年（六二八）至十九年（六四五），玄奘（六〇二—六六四）西行取經，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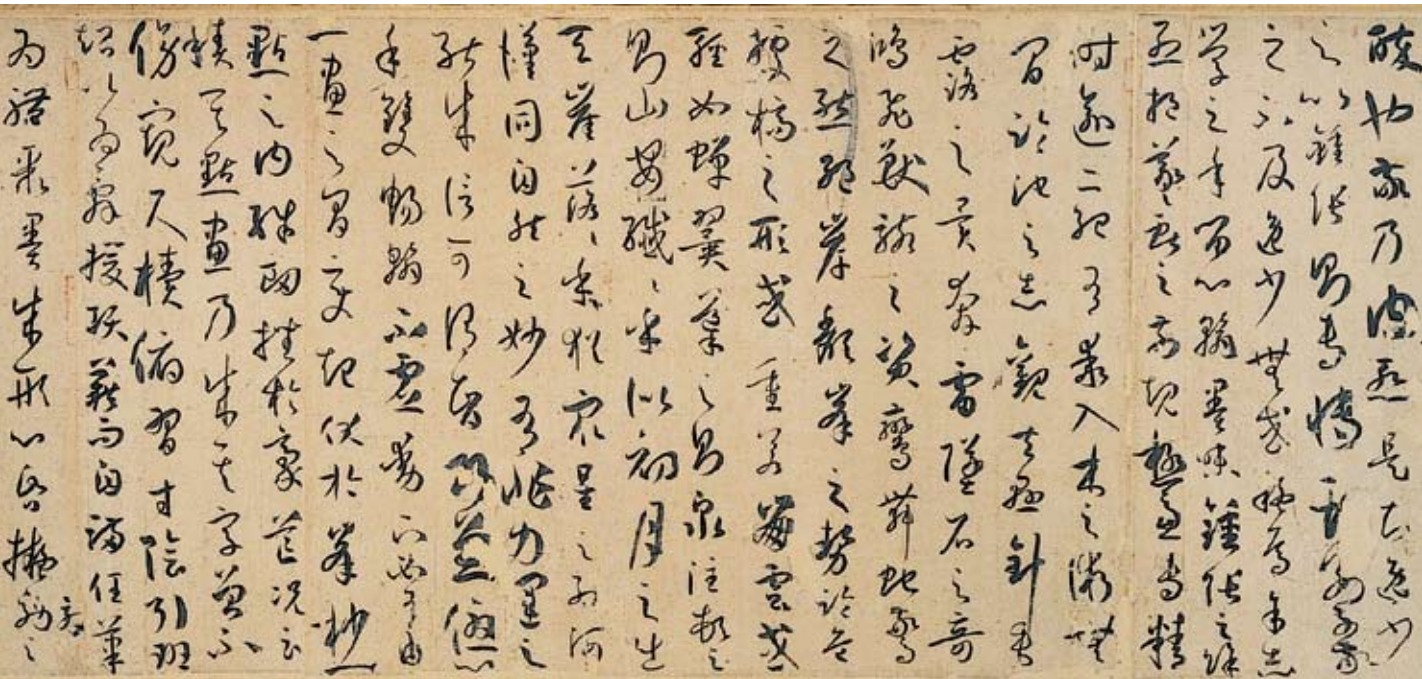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四 〈定武蘭亭真本〉拓本 卷 24.9×66.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功歸來長安，太宗迎見，慨然資助玄奘的譯經事業，並於貞觀二十二年（六四八）為新譯經作序，寫成七百八十一字的序文〈大唐三藏聖教序〉，並進行隆重的宣讀儀式，法師既奉序，上表致謝，帝看表後，答書自謙鄙拙。隨後皇太子（即高宗）也作了一篇〈述聖記〉。是年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侶等，請鑄二序文於碑石，藏之寺宇。後由寺僧懷仁等，彙集王羲之書，進行勒石立碑的工作。碑文包含了五個部份：（一）太宗〈大唐三藏聖教序〉，（二）太宗答玄奘來書，（三）高宗〈述三藏聖記〉，（四）高宗答玄奘來書，（五）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。在集字、潤飾文字及勒石、鐫刻，都十分慎重，所以遲至高宗咸亨三年（六七二）始完成。全碑所集王羲之字以行書為主，間雜楷、行二體，因為是集字而成，筆勢與章法不免「少天然

卷舒之妙」，不過整體上仍能反映出王羲之瀟灑俊美的書風。〈集字聖教序〉的拓本有未斷本與斷後本之別，又有傳為唐拓硃砂本，歷代也有翻刻本，前人辨別意見紛陳，本院承接清宮舊藏有三本，拓製年代有待進一步精密的比勘。展出的一本推定為南宋拓本。就書法史而論，懷仁〈集字聖教序〉有三方面意義：其一，確立王羲之書法的典範，塑造唐宋以後的「院體」書法。其二，透過石刻拓本的流傳，更有效的散播王羲之傳統的影響。其三，對照現今傳世墨蹟與刻帖，可以在〈蘭亭序〉、〈喪亂帖〉、〈奉橘帖〉及〈淳化閣帖〉中的〈晚復帖〉、〈自慰帖〉、〈極寒帖〉、〈四月五日帖〉、〈近尋帖〉中尋索到當時集字的來源。

永和九年（三五三）三月三日，王羲之在會稽郡山陰縣（今浙江紹興），與友



圖五 孫過庭《書譜》 687年 卷 局部 26.5×900.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人孫綽、謝安、謝萬等四十一人，於蘭亭舉行修禊雅集，曲水流觴，飲酒賦詩，寫下著名的蘭亭詩序，為唐太宗所藏，墨蹟雖然已經失傳，不過唐代以來即轉化為無數的臨摹本與石刻拓本，成為歷代書法家學習行書的範本。〈定武蘭亭〉拓本是其中一種，由於刻石在定武（今河北真定縣）發現，因此以定武為名。鑑賞家從筆法風格推測，可能是根據歐陽詢的臨摹本上石，是蘭亭諸刻中最好的本子。後人對於〈定武蘭亭〉有許多討論，重在各種傳本的鑑別、來源、模拓之精粗、拓紙的厚薄、拓墨的濃淡、字蹟的肥瘦及五字（湍、流、帶、右、天）已損與未損等問題。檢視展出的〈定武蘭亭真本〉，（圖四）此本拓墨稍淡，字蹟筆畫略粗，右下角「會」字缺損，第十四行與十五行之間，即「欣」字與「不」字之間，有蕭梁時鑑帖

人徐僧權押縫的「僧」字。第七行、十四行泐損，第十一行到十七行的裂紋，石高低不平，拓墨呈深淺濃淡之別，五字有缺損。這些都符合宋元人所論述的舊刻損本的特徵。卷後有北宋人長篇題跋，其次有元代清代重要書畫家及收藏家的題識與鑑藏印記，流傳有緒，是目前所見最好的拓本。

### 書法理論與實踐

唐代初期對於王羲之書法的鑑藏與頌揚，在半世紀後，孫過庭的〈書譜〉卷（圖五）中見到顯著的影響。〈書譜〉卷書於武后垂拱三年（六八七），流傳至今一千三百多年，最早記載於米芾（一〇五二——一一〇八）《書史》中，歷代評論家大都認為此卷的書法理論深得書法藝術的旨趣，而卷中優異的草書表現，又能得到王羲之的真傳，後人可以從此卷重建王羲

之今草書的傳統。全卷內容可分為四個段落：第一段，藉王羲之與鍾繇，張芝在「博涉」與「精工」，「今妍」與「古質」的區別，尤其強調兼通各種書體的重要性。第二段重點在闡述編錄《書譜》的原則，舉出七類不擬收錄的文獻，包括常俗所見的羲之《筆陣圖》七行，浮華不實的諸家勢評，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，以及其他虛誕詭異或非訓非經之論，而從對初學者實際書寫有幫助的「執、使、轉、用」的方法入手，使學者「窺其根源，析其枝派」，以簡易明確的理論啟發學者。第三段舉出「據為宗匠，取立指歸」的臨學的範本，以王羲之《樂毅論》、《黃庭經》、《東方朔畫讚》、《太師箴》、《蘭亭集序》、《告誓文》等「真行絕致者」為例。臨習時須著重內在的心理因素（情與理），而非外在的形體。第四段論書

法學習的進程、態度及境界。初學者當精熟規矩法度，經過平正—險絕—平正的階段，達於人書俱老的通會之境。在心態上，不「自矜」、不「自鄙」，精心考察，取法古賢。奠定基礎後，再超越個人的局限，調和用筆的勁速與遲重，骨力與遒麗，質直與剛佷，廣博兼通，拋卻古人規矩，展開自我的探索。最後感嘆知音難尋，諷刺時人之不識，說明全書的構成為六篇兩卷，取名為「書譜」。這些論述經常被評論者引用，是一篇文辭優美的書學理論經典之作。《書譜》中對王羲之的論揚，反映出孫過庭綜合性的書學主張，包括要廣泛的學習各種書體，書法內容與外在形式的配合，古人法度與自我風格的追求，各種筆法的折衷調和等，本卷書法也印證了這種綜合性的特質。

關於《書譜》卷的分卷、序或全文、改寫、裁切改裝、

圖六 懷素《自敘帖》 777年 卷 局部 28.3×75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摺行與節筆等問題，近現代學者有許多討論，二〇〇五年本院與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合作，進行全卷光學攝影檢測，配合本次特展，出版檢測報告，並隨原卷展出部份檢測成果，結合文獻資料的考察，提出對於本卷更多明確的訊息。

## 書如其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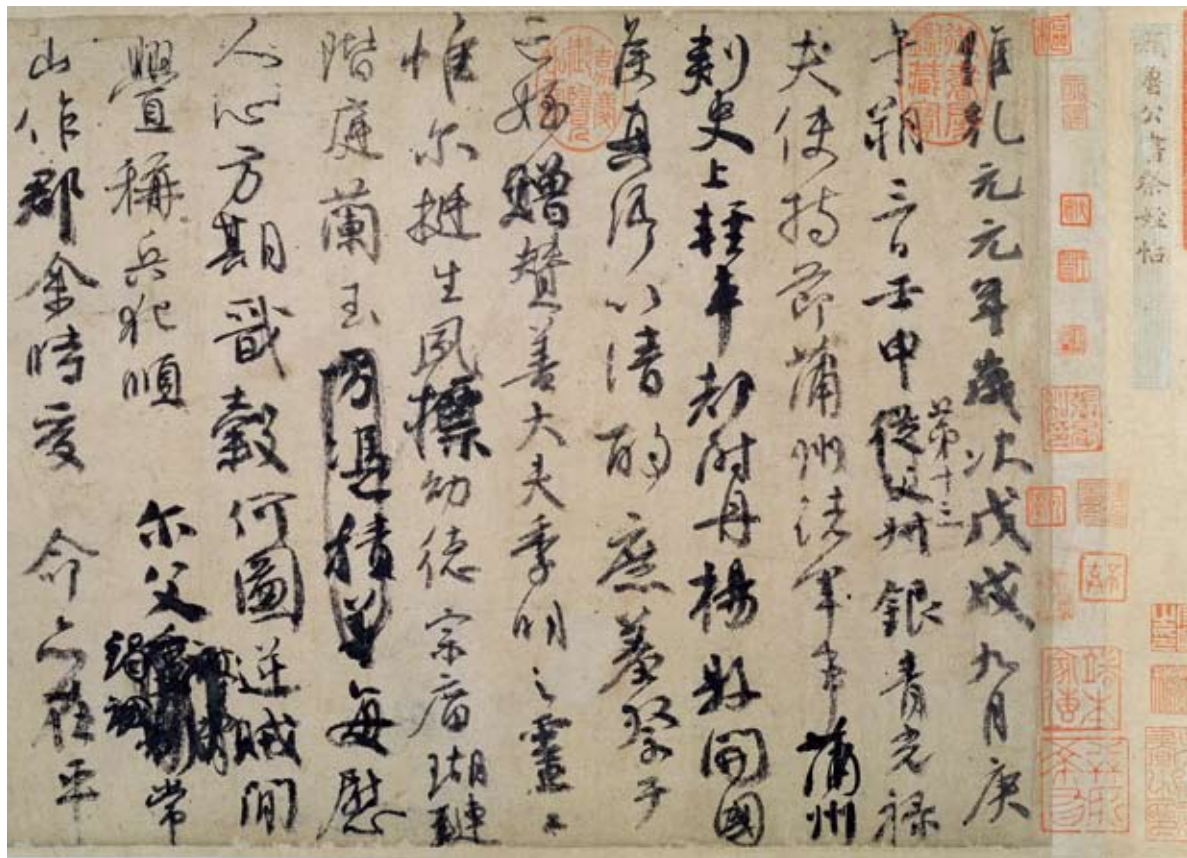
展覽中另一件長篇草書鉅作為「狂僧」懷素的〈自敘帖〉卷。(圖六)全卷一二六行，七〇二字，抄錄顏真卿等同時人的敘言與贊詩，卷後有大曆十二年(七七七)紀年，約為四十一歲的傑作。對照〈書譜〉卷，〈自敘帖〉狂放縱逸的面目，突破了初唐以來宮廷書家莊重的古典書風。時人稱讚他「以狂繼顛」，承襲張旭(活動於八世紀前半)的「狂草」書風，他也以此成就為傲。大抵此卷強調連綿草勢，一字之中點畫連續不斷，而前一字收筆再引帶下一字的

起筆，運筆上下翻轉，忽左忽右，起伏擺蕩，其中有疾有速，有輕有重，像是節奏分明的音樂旋律，極富動感。此外也有點畫分散者，強調筆斷意連，生生不息的筆勢，筆鋒迴護鉤挑，一字、一行，以至數行之間，點畫互相呼應。通幅於規矩法度中，奇蹤變化，神采動蕩，實為草書藝術的極致表現。

懷素(活動於八世紀後半)，俗姓錢，字藏真，湖南長沙人。少年時出家為僧，修習佛經之暇，熱衷於草書藝術，在鄉里享有盛名，受到詩人文士的讚賞，紛紛投贈詩歌。約大曆三年(七六八)西遊京師長安，尋訪古代書蹟，與名公貴卿交往，狂草絕藝在京城得到更多的讚揚。大曆七年(七七二)歸鄉，途經洛陽，與顏真卿(七〇九—七八五)會晤，顏真卿為諸家贊詩書寫敘言，懷素摘錄部份詩句，有形容其草書的形狀，

寫草書的狂態，落筆的速度等，並自述學書經歷，以狂草寫成此卷。全卷無論就尺幅、字數及字體大小，在唐代以前的行草書蹟中，都是絕無僅有的。

〈自敘帖〉在宋代相傳至少有三本，本院所藏是現今僅存的一卷，有南唐(九三七—九七五)內府鑑藏記錄，宋初為出身鑑藏世家的蘇舜欽(一〇〇八—一〇四八)所藏，歷經北宋、南宋、明、清人收藏，乾隆皇帝時入藏清宮，總計有一千多年的歷史。近年來關於這卷僅存的墨蹟是真蹟還是摹本？題跋是否後人移配？傳世刻本與本卷的關係等問題，學者間有熱烈討論，二〇〇四年本院與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合作，針對此卷物質狀況進行非破壞性的光學檢測，確定第一張紙與後幅不同，書蹟非雙鉤填墨，並新發現卷首有北宋人邵叶(一〇七九進士)收藏印記及可能為南宋人所鈐的



圖七 顏真卿〈祭姪文稿〉 卷 28.8×75.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南昌縣印」殘印，可為推斷本卷下限年代的依據。

懷素的狂草重在書法技藝的展現，至於以書法表達心性，當推顏真卿（七〇九—七八五）的〈祭姪文稿〉。天寶末年（七五三—）顏真卿於平原郡太守任上，抵禦安祿山叛軍，晚年為李希烈陷害，《新唐書》傳贊曰：「當祿山反，哮噬無前，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，功雖不成，其志有足稱者。晚節偃蹇，為姦臣所擠，見殞賊手，毅然之氣，折不沮，可謂忠矣。」

顏真卿之聞名於世，另一因素是書法上的成就，他一生留下許多大字楷書碑銘刻石作品，這些書蹟用筆豐厚，結體寬博方正，突破了初唐三家歐陽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精密典雅的宮廷規制。論者指出顏真卿以圓而率直的用筆，革新楷書，並建立了一套新的標準，不同於早期書家寫楷書時，著重每個字不同筆畫的「筆



圖八 顏真卿《劉中使帖》冊 29.4×43.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勢」，顏真卿則把各種形態的筆畫統攝於藏鋒圓筆，使字體獲致新的結構上的完整。同樣的方式也見於他的行書作品，兩件僅存的名蹟——《祭姪文稿》（圖七）與《劉中使帖》即為其例。

天寶末年安祿山舉兵河朔，顏真卿在平原郡與守常山郡的堂兄顏杲卿聯合，阻絕叛軍歸路，當時遣外甥盧逖，姪季明為兩城通使，密商挫賊之計。後叛軍攻陷常山，脅迫杲卿投降不成，乃殺害盧逖與季明，杲卿也在洛陽被處死。肅宗乾元元年（七五八），顏真卿為蒲州刺史，迎季明首級，書祭文祭之，文中述說季明是顏氏家族優秀的一員，慘死於戰場，最後表達深沉的哀痛。這件墨蹟在蒼勁枯潤，塗塗抹抹中，充滿了惋惜、忿怒、悲憤的情緒，後人認為是僅次於《蘭亭序》的「天下第一」名蹟。由宋徽宗御府，遞傳於元代鮮于樞、張晏，明代吳廷，

清代徐乾學、王鴻緒以至乾隆帝御府。

《祭姪文稿》與王羲之的《平安何如奉橘帖》相距約四百年，書法風格有顯著差異。唐摹《平安何如奉橘帖》忠實的模擬王羲之重於筆鋒使轉的特色，由下筆、轉折到收筆，大多保留筆毫銳利的鋒勢，顯現出靈敏俊秀的氣質。《祭姪文稿》用禿筆中鋒，少有銳利的鋒勢，枯勁的筆觸在表面略為粗糙的麻紙上，更顯現透入紙面的力度。主張書法為人格反映的歐陽修，不但收藏多件顏真卿碑刻拓本，也師法顏書，他說：「顏公書如忠臣烈士，道德君子，其端嚴尊重，人初見而畏之，然愈久而愈可愛也。」又說：「斯人忠義出於天性，故其字畫剛勁，獨立不襲前蹟，挺然奇偉，有似其為人。」（《集古錄》卷七）這種以人論書的觀點開啟了後世重視書家人格、修養與學識的士人書法。



圖九 徐浩〈朱巨川告身〉 卷 局部 768年 27×185.8公分

書於碧箋上的〈劉中使帖〉，（圖八）是顏真卿晚年僅存的大字行草書墨蹟。這件書札中沒有顏真卿款，也無受書人上款，元代收藏家引證《宣和書譜》的記載，確認是歷經宋徽宗宣和內府與南宋高宗紹興內府的舊藏。現代學者則引《舊唐書》〈代宗本紀〉，及田承嗣（魏博節度使）本傳等史料，確證帖中所述，與大曆十年（七七五）降服田承嗣的史事符合。與〈祭姪文稿〉比較，此帖用筆更加雄健豪邁，揮灑自如的在行書中參入草書，如前後兩見的「足慰」的「足」字，第六行「盧子期所圍」五字，同一字如第二行與第五行「州」字，也有或行或草的變化，第四行「耳」字末筆長垂，尤其顯露出書寫時痛快欣喜的情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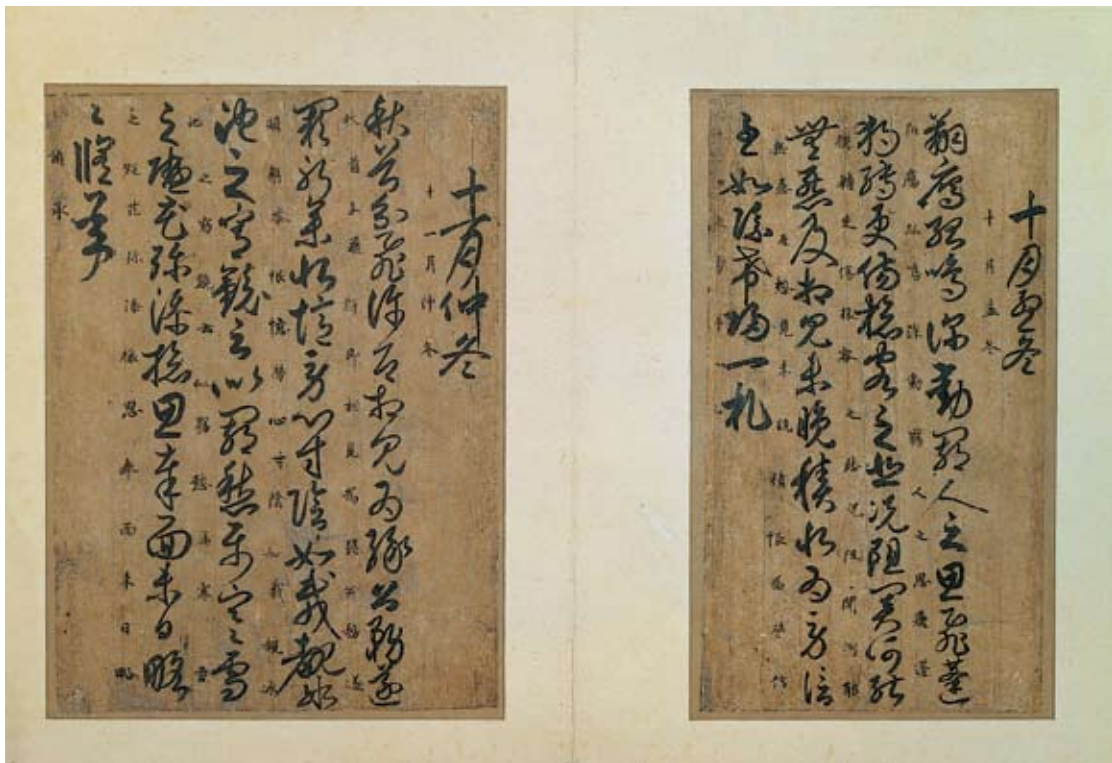
顏真卿早年曾受張旭（六七五—七五九）指點書法，張旭與賀知章、李白等號為「飲中八仙」，他的草書又

與李白詩歌、裴旻舞劍並稱為當代「三絕」。顏真卿為狂僧懷素作〈懷素上人草書歌序〉也特別提到與張旭的關係，這些狂放不羈，崇尚個性表現的藝術家，在文學、舞蹈與書法藝術上，共同開創的新風氣，必然影響了顏真卿行草書的創作，〈劉中使帖〉雜入連綿草勢，或佔去一行的長垂筆畫，都反映了這種風尚。

### 應用文書與書法

唐代以科舉制度取士，中央的國子監與地方府學都重視書法人才的培養。優秀的能書者，經由銓選制度，供職中書省等機構，擔任朝廷詔令文書等繕寫工作，甚至受到皇帝的重用，徐浩（七〇三—七八二）即為一例。

徐浩與顏真卿齊名，十五歲明經及第，在玄宗、肅宗、代宗、德宗四朝，歷任中央及地方官，早年仕途順遂，尤其肅宗朝時，召授中書舍人，



圖十 唐人 十二月朋友相聞書 冊 31.2×4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《新唐書》本傳記載：「四方詔令，多出浩手。遣辭瞻速，而書法至精，帝喜之，又參太上皇誥冊，寵絕一時。」徐浩傳世多碑刻紀銘之作，宋代《寶刻類編》收錄六十餘件，以現存西安碑林，書於建中二年（七八一）的《不空和尚

衡和年月上，整齊的鈐蓋「尚書吏部告身之印」計四四方，可知告身的授與有一定的制度，本卷是說明這種制度的珍貴史料。至於書法風格，圓鈍豐腴，結體端莊嚴謹，顯示由歐陽詢以至顏真卿的唐代楷書的典型。

碑》最著名。展出的《朱巨川告身》卷（圖九）是僅存的傳統作品。所謂「告身」，是朝廷授與臣僚官職的任官令，依照官職品位的高低，有不同的格式，本件告身屬於六品官的「勅授」，頒給原任睦州錄事參軍的朱巨川（七二五—七八三），新任大理評事，並兼任豪（濠）州鍾離縣（安徽鳳陽）令。勅文以左衛兵曹參軍莊若訥領銜，同時敘任數人。唐代文官銓選的項目包括體貌、言詞、文理、德性、才能等，所以勅文有「氣質端和，藝理優暢」之語。其中列名結銜的包括了中書省、門下省與尚書省的官員，而在新職

官方公牘文書外，一般私人書簡的形式與用語，也有約定俗成的規範，稱之為「書儀」。編寫尺牘範本的傳統由漢魏至唐五代，逐漸盛行。其中一類稱為「月儀」，分十二個月，每月一則，列舉當月尺牘用語，如問候、思念、祝福等詞句，供寫信時引用。西晉索靖（二三九—三〇三）及隋代智永都有《月儀帖》傳世，元明清時期也有數本墨蹟及一件刻本流傳。展出的《唐人十二月朋友相聞書》（圖十）可能因為殘損，由卷改裝為冊時，裁去正月孟春、二月仲春、五月仲夏三則。末識：「吾前後書，惟此（本佳）」

也。「無款印。前後有明代宮廷書家解縉（一三六九—一四一五）、清代書家王文治（一七三〇—一八〇二）及乾隆朝書人趙秉冲（一七八二—舉人）的題跋。鈐有金章宗（一一九〇—一二〇八在位）的藏印及三方古印。解縉認為本冊是唐人書，有歐陽詢（五五七—六四一）筆意，王文治認為與孫過庭有關。此書用筆沉穩，結體與世傳智永（活動於六世紀後半）〈真草千字文〉相似，小字釋文亦精秀有神韻，具有唐代風格。

唐代書法文化普及且興盛的原因，除了培育士人的公私學校重視書法之外，由於雕版印刷術尚未發明，圖書經籍需要人工抄寫，也直接促成書法文化的發展。其中詩賦文學所需要參考的「韻書」即依賴傳抄流布。始於隨代的陸法言《切韻》，經過唐代諸家箋注、增修及刊謬補缺，在開元

年間達於完備，通稱為「唐韻」，以抄寫唐韻著稱的傳奇女書家吳彩鸞（活動於九世紀），傳說「一夕書一部，即鬻與市」（玉堂嘉話）。至宋徽宗時內府即藏有十三件，不過至今僅存本院與北京故宮所藏兩件傳本。展出的這件吳彩鸞〈唐韻〉彙錄了當時所見的三種箋注與校正本，並於前幅抄錄了王仁昫（八世紀初）與長孫訥言（六七七）相關撰著的序文。根據策展同仁的研究，並復原最初裝裱的形式，發現與北京本同為宋人所稱的「龍鱗裝」（或旋風裝），並進而推斷應為徽宗內府的舊藏。

這件吳彩鸞〈唐韻〉雖然作為實用性質的文書，也顯示出精妙的小楷書技藝，通幅點畫中規應矩，毫不苟且；結體略扁方，筆法方圓並濟，加以部份古寫的字形，在風格上近於世傳王羲之書道教經典

〈黃庭經〉。南朝以來，〈黃庭經〉即傳為王羲之著名的小楷書蹟，唐代褚遂良〈右軍書目〉列為正書五卷之一，孫過庭〈書譜〉將〈黃庭經〉與其他五件書蹟定為「真行絕致者」，徐浩〈古跡記〉則記載〈黃庭經〉於天寶十四年（七五五）安祿山亂後亡佚。從北宋人的記載，傳世有單刻帖或臨摹本，可知流傳很廣，也可推測具有道教背景的吳彩鸞在書風上與此經的關係。

本次特展中，另有幾件傳稱作品，如王羲之〈大道帖〉、懷素〈小草千字文〉、褚遂良〈摹王羲之長風帖〉、〈黃絹本蘭亭〉、陸柬之〈陸機文賦〉等，作者及時代均有待進一步考辨，在特展圖錄單件作品說明中，策展同仁均有深入的論述，提供讀者參考，本文不另贅述。

作者在職於本院書畫處